

黄子平:从无边的独白中发起对话



黄子平 受访者供图

1985年,“燕园三剑客”黄子平、陈平原与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描述了一种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期研究格局,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的文学研究想象。这个大胆的想法,挑战曾经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叙述,呼吁把文学史还给文学。

这也是黄子平四十年来的批评实践。因为举重若轻的分析风格和独特的学术个性,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小提琴手”。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黄子平,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型,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文学史”。

他甚至有一个激进而有点虚无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文学史’,只有‘文学批评’;准确地讲,文学史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尽管它有成套的概念工具,有历史形成的叙述传统,有高等教育体系的支撑,但未必就比别的感性的、偶发的、随风飘逝的文学批评优胜。”

近日,黄子平出版《文本及其不满》,以批评家的眼光审视二十世纪以降的中国文学界及文学批评界。从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林斤澜、王安忆、黄春明、刘大任,面对大维度的作家群落,黄子平以疏阔幽默、真诚机警的笔调,另类阅读他们。

在黄子平看来,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与钱理群、陈平原、赵园、李陀、王安忆……作为同时代人,彼此之间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但却在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无限交谈,构建文学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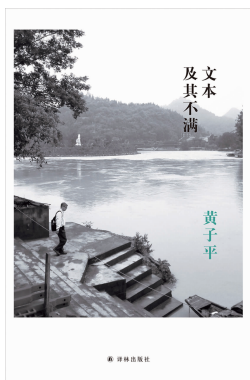
关于《文本及其不满》这个略显另类的书名,黄子平在前言中解释,是套用弗洛伊德的名著《文明及其不满》,“只改了一个字,纯粹是为了好玩,别无什么深意。跨语际阅读、翻译、词语的置换和重组、对经典的致敬与模仿……所谓‘好玩’,有点儿罗兰·巴特的‘文本之愉悦’的意思。”

在新书的封底上,有这么一段话,是对黄子平《文本及其不满》一书、也是对他四十年来批评实践的恰当总结:

“通过散文、评论、演讲、访谈,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构筑起一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语言堤坝。作者仿佛是站在坝上行走的旅人,面对漫漶而来的文字洪水,回想过往知青岁月、读书生涯,重读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目之所及遍布海内外。以批评家的姿态,反思批评的位置。”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白雁

而且深刻表达了这种『看到』带来的颤栗和恐惧。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一直面生存深渊的作家,他看到了深渊。



《文本及其不满》
黄子平 著
译林出版社



黄子平

一九四九年生,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论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中国小说年选”、“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等。

1

读品:谈谈您从事文学研究的经历。

黄子平:我本来是个理科男,中学时数理化的成绩颇佳,下乡八年多,全部荒废了。恢复高考,仗着发表过几首破诗,斗胆报考中文系。结果一入校,听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杨晦老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其实不需“培养”,文学专业77级的很多同学(如陈建功、黄蓓佳),入学前就已经是崭露头角的作家和诗人了。大家还立了个“社”,叫“早晨文学社”,办了个油印杂志《早晨》(只出了四期),推我当“主编”。小楂(查建英)投了一篇小说《最初的流星》,我觉得写得好,就写了一篇评论,这应该是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了。不久又应北岛之邀,评论他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在著名的油印杂志《今天》。后来我说“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它不是某种“项目”,也不是机构或老师布置的“作业”,更不是商业市场的“软文”,而是“同时代人”的文学感应和表达。我在好几家大学中文系教书,对杨晦老先生的中文系培养目标有所修正。中文系培养什么人呢?培养专业读者,经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在一个“意义”崩溃溃散的世界里,太需要“专业读者”来寻找、创造和重建“意义”了。

读品:这本《文本及其不满》中,收录了《批评的位置》一文,我从中读出了对当下文学批评界的一种焦虑,焦虑何来?如何缓解?

黄子平: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界”没有感觉。

读品:在您从事文学批评的四十年中,批评的位置有无改变,位置何在?

黄子平:批评现在找不着“位置”了,从前还可能有一种“地理中间物”的状态,一种鲁迅所说的“横站”的可能,如今荡然无存了。当然,一方面是全世界普遍的种种撕裂,到处要求非黑即白的站位;另一方面,世间瞬息万变的移位变形,根本无从选择立足之地。

2

读品:您对鲁迅的研究,角度很有意思。如果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介绍鲁迅的创作成就,您会怎么介绍?

黄子平: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一直面生存深渊的作家,他看到了深渊,而且深刻表达了这种“看到”带来的颤栗和恐惧。借用阿甘本对“当代人”的定义,鲁迅是洞察时代的黑暗面的作家,他能感受时代的黑暗之光,他像蘸墨水那样蘸着时代的黑暗写作。

读品:在《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您分析了从古至今文人与女性“邂逅相遇”的一种叙事模式。由此文联想到一个问题,在您从事文学批评的四十年中,女性在传统文学中作为被书写对象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当一部分女性变成了书写者本身,您关注女性的创作吗?可否略作评价。

黄子平:白居易这个自恋的文人建构了一个“天涯沦落人”的虚假的“同”,把自己的仕途坎坷投射到一个琵琶女身上,赢得千古读者一洒青衫泪。这个叙事模式的一再重现后边,是一种文化的“结构性”积淀,这种重现还在继续。当然会有很多新的变奏,譬如这个男性叙述者,可能是一个老干部或者破产企业家之类,沦落者的变形花样就多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彻底颠覆和消解了这个叙事模式,“上海小姐”才是那个主导视角,天涯沦落人是那个“老克腊”,绝妙。

读品:您做了很多“重读”的工作,重读《小鲍庄》,重读林斤澜,重读汪曾祺等等。您认为重读的意义何在?

黄子平:批评即重读。匆匆忙忙的阅读不是真正的阅读,文本印证了你的既有观念和偏见,你心满意足,丢下这一本去读另一本,仍然是匆匆忙忙。重

读的愿望来自于文本的挑战,有一些无法理解的东西,一些让你诧异的东西,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东西,于是有了重读之必要。当然你会发现,值得重读的文本不多。

读品:您关注当代的年轻作家吗?
黄子平:我不太关心作家的年龄或世代(老当益壮啦天才少女啦),我的分类学是这样的:作家和好的作家;作品和值得重读的作品。

3

读品:您的阅读,特别关注文本本身,在意细节,这种习惯始自何时?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子平:文学读者都明白,情节可以一再重复、重演,唯有细节必须新鲜、独一无二。所谓“精彩的细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画面感,二是有心理深度。你无法对所有细节一视同仁,而那些精彩的细节让你触目难忘,甚至藉此将某种“时代意义”凝聚其上,譬如鲁迅的闹市巾背着透明的青色剑的黑衣人,或张爱玲那个在“脏而破的夜”中不能奋飞的蝶。

读品:20年前您出版了《边缘阅读》一书,这个书名非常有趣。您曾说过,就广义的“阅读”而言,“边缘”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那么其意义何在?二十年来,您的观念有无变化?

读品:金克木先生在《读书》杂志有一篇短文《说“边”》,文中说,没有“边”,何来“中心”?对我大有启发。后来我又接触了俄国思想家的“边界理论”,他说得更绝:“人整个生存在边界上”。国内对巴赫金的接受侧重于“复调理论”和“狂欢节理论”,其实这些都是从他的“对话哲学”里发展出来的。边界由于“他者”的存在,对话即由此发生。有两种“独白”都是由消泯了“他者”的边界,一种是皇帝的独白,我说了算,他者并不存在;另一种是奴才的独白,他无边地融入统一的主流意见之中。“边缘阅读”之必要,正在于从无边的独白中发起对话,或拯救对话。

4

读品:2015年您写有《黄春明小说中的传媒人及其尊严》,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传媒人和传媒领域的改革巨浪,又过了五年,对如今的传媒现状(尤指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冲击巨大的现状)及未来您有什么看法?

黄子平:我想您的问题都凝聚在如下的画面里了:那个“推特治国”的总统对提问的亚裔女记者很不礼貌地翻白眼——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种族,性别,地缘政治……我真的很希望有文学家在21世纪继续推进和拓展黄春明的主题,写出传媒人及其尊严面对的严峻情势。

读品: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巨大,在读你的批评文章时,我感到,首先要理解西式的批评系统和表达模式,才能进入您的表达。对普通读者而言,这种批评比较生涩难懂?意义何在?

黄子平:是吗?一直有人夸我的文章平易近人,理论全都消化在通俗的表达里了呢,真是不好意思,看来我还得努力。不过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是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已经是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了,所以批评运用的理论资源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已经无关紧要。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